

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实的反思

李金华

摘 要：当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即经济学学术论文有着难以掩饰的数学崇拜或数学推崇现象；经济学中数量模型的不完整或缺陷直接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也十分困难。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理论常常表现出无奈和怯力。经济学家、经济学者需要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把经济学研究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类进步所求之上，这才是真正的经济科学研究，才是社会和公众所欢迎期待的经济科学研究。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量模型；不确定性；理论滞后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8)02-0166-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2.018

新媒体最近流行几篇文章，分别是《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1]（以下简称《错》文）、《经济学家的数学崇拜》^[2]（以下简称《崇》文）、《经济学家的傲慢与无知》（以下简称《傲》文）。三篇文章有的是早先发表而最近被重新提起，有的则是新近发表。仅从题目看，这几篇文章应该不受经济学家们欢迎，但它们却在学术界广为流传。意外的是，学术圈内颇为宁静，未引起大的争议，尤其是鲜见有不同观点或针锋相对的文章面世，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几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三点：经济学家们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数学才华，在经济学研究中注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的漂亮和精确，却忽视模型揭示真实客观世界的能力；经济学家们充满自信和骄傲，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无论多么复杂的现象都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的，只要构建了模型，其研究方式就是科学的，研究结论便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常常难以作出正确的预测，时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常常束手无策，但这不曾动摇过一些经济学家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几篇文章用直白率性的语言，痛陈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剑指学界不能回避、不可否认的现象，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学术界可能对这些文章的观点持有不同的认知，但迄今未见有挺身发声的学者，也未见有针锋相对进行驳斥的文章。这几篇让一些经济学家们颇为难堪、一时语塞的文章确实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现实，也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无奈，应该引起经济学界的深刻反思。

一、经济学学术成果的高度数字化

如同《错》文和《崇》文所述，当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即经济学学术论文有着难以掩饰的数学崇拜或数学推崇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作者简介：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第一，经济学论文大多都会有数量模型。从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看，经济学论文都是有数学模型的，无论是规范性研究成果，还是实证性研究成果，数学方法、数学模型都在论文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如果没有较过硬的数学功底，这些论文一般人连看也看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数量模型应用泛化。

中国经济学论文模型泛化起自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彼时，一批海归学者学成归国，逐步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范式 and 方向。特别是随着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数学色彩浓厚的课程的开设，中国经管类的研究生很好地掌握了数学工具，这使得计量方法、数学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能大行其道。特别是数学建模、计量分析方法成为经济学博士生培养的核心课程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基本承袭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经济学论文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理论依据——研究假设——模型设计——模型检验——研究结论。不宜指责这种研究范式的不妥，也不能否认模型和计量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对数量模型的过度推崇，似乎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数量模型描述，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用数量模型解析。

事实上，数量模型是由客观现实抽象出来的描述现象特征和现象间相互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它借助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来刻画客观经济现象，其表达形式是方程式。数量模型由变量、参数和随机误差等元要素构成。其中，变量反映经济现象特征或现象变动情况；参数是用以求出其他变量、决定方程式的待定常数；随机误差是无法预知、不可确定的因素。在内容上，经济模型的背后是客观事物和经济现象。而在现实中，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并且是动态变化的，有限的若干个变量是很难精准地反映所要描述的对象。特别是经济现象的变化过程常常受到不可预测的随机因素的影响，而随机因素不易捕捉又容易在数量分析中被忽略，但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随机因素可能严重地影响了事物或现象变化发展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数量模型可能出现预测不准、结论不可靠的情况。

第二，数量模型成为许多学术论文的主体。经济学学术成果高度数学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一篇研究现实问题的论文有相当大的篇幅是理论模型的描述、应用模型的设计、模型的各种检验，而研究结论或研究发现、有关问题本身的分析、对问题本身解决的对策则是寥寥数语。如果一篇研究现实问题的论文，大量的笔墨不是对问题的剖析，不是解决问题的措施，反而是数量模型的构建、模型的检验等，这显然是不妥的。若学者是无意而为之，至少是喧宾夺主，偏离了主题；若是有意而为，则就如《崇》文所述的有数学炫技之嫌。特别地，当学者费力设计出的数学模型仅仅是说明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或是证明了一个诸如“兔子长了两只耳朵，马有四条腿”这样显而易见的命题，这就需要引起警觉。事实上，这种以众所不知的语言说明一个众所周知问题的现象在当下的经济学研究中决非个案。如果把此类娱乐性的文字游戏也称之为经济科学研究，那无疑是对“科学”一词的贬损。

第三，一切问题都试图以数量模型解决。在现今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少经济学者对经济模型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依赖。在一些学者看来，一切经济现象均可以用数学来说明，一切经济问题均可用模型来解决，于是就出现了估计一个地区吸毒者的数量模型、反映官员升迁与地区增长的模型、反映传统婚礼最优参加人数的模型、雾霾污染与官员晋级的模型、反映官二代如何获入优质中学的数量模型等。在这些学者眼里，数量模型就是一个法宝，放之四海而皆准。一篇经济学论文，有了数量模型就有了立论的依据，就占领了制高点；有了数量模型，研究的结论就有了科学理论的支撑。模型越复杂就越科学，模型越复杂水平就越高。

数量模型反映客观事实与事物内部的结构、现象间的关系。数量模型的构建需要有数学理论基础，也需要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作支撑。如果以数量模型来分析研究客观经济问题，就必须要求所

设计的模型能精准、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而做到这一点恰恰是极为困难的。2014年,斯坦福大学金融经济学家保罗·弗莱德尔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论文《变色龙:理论模型在金融与经济学中的滥用》^[3],严肃地批评金融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中数量模型的滥用问题。他把模型比作一个变色龙,认为:模型即使建立在一个值得怀疑的真实世界基础之上,也仍可以得出结论,故而不能不加鉴别地或不足够审慎地将数量模型应用于我们对经济的理解中。他指出了数量模型的局限,批评了模型应用的随意性。美国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保罗·罗默2015年发表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4]一文,揭示经济学研究中多年来持续存在的滥用数学模型的现象,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大牌经济学家也存在的数学模型滥用问题。罗默认为,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滥用不但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使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晦涩难懂。经济学家们应该用更为直接、易懂的语言来展现他们所擅长的知识,而不是如现在这般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似乎只要建立了模型,其研究方式和结论便有了充分的正当性。

应该承认数量模型可以帮助经济学家进行分析和推论,但过度夸大数量模型的功能,过度强调数量模型的普适性,甚至对数量模型产生崇拜,这就走极端了。现在,国内主流的或被公认的权威经济学期刊,其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多都是要有数学模型、数学公式,没有数学模型和数学公式,就体现不出技术含量、表现不出学术水平,模型和公式成为经济学研究成果水平的核心标尺,以文字表现的论文的观点、思想则显著地被忽视了。较之论文的内容,论文的表达形式更显重要。经济学与数学是如此之近,而经济学思想、经济科学成果离大众却又是如此之远。现实中许多普遍常见的经济现象,在经济学者的笔下被描绘得如此深奥无比、晦涩难懂。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其表现形式重于成果本身,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

模型无所不适,无所不能。有了数学模型,模型通过了检验,研究就成功了,研究结论就立得住了,研究范式就科学了。正是这种认知,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模型的泛化和滥用。

数量模型滥用、泛用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导致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这里的不确定性主要指研究结论的不可信、不可靠。正如《傲》文中所提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富尔卡德教授的观点:经济学中的某些原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实际上含混不清,在经济学研究中晦涩难懂、充满矛盾。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凭借数学上的优势,常常喜欢设计经济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问题。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漂亮模型的设计上,努力地使数量模型能通过各种检验,但模型捕捉客观现实的能力却被他们轻松地忽视了,而这恰恰是致命的。

一切数量模型都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经济数据主要分为三类: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当然也有一些通过专门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如离散数据、计数数据、截断数据、持续时间数据等。根据不同类型的数据,可能设计不同的数量模型,但所有的理论模型都是有假定前提的,而且对数据性质也是有要求的。为解决建模过程中遇到的数据缺失或数据失效的问题,经济学者们煞费苦心,耗尽了心力,总是能使各类数据拟合出各类数量模型,使得建模能够成功。例如,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建模往往要求数据是平稳的,面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学者们通过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可以解决数据的平稳性问题,从而建立起数量模型。如果截面数据出现异方差性,即对于不同的样本点,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不再是常数,而是互不相同的,可能导致参数估计量失效,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也失去意义,进而降低模型的预测功能,经济学者发明了图示检验、戈里瑟(Gleiser)检验、巴特列检验、G-Q检验、怀特检验等进行异方差检验,而后用加权最小平方法、广义最小平方法等解决建模的参数求解问题。经典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如果存在相关关系,即

出现序列相关，会影响模型的预测和分析，经济学家们探索了德宾-沃森（DW，Durbin-Watson）检验、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用广义差分法来解决建模问题。如果多个解释变量存在相关关系，即出现所谓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经济学家们发明了差分法来排除引起共线性的变量，或者用岭回归法来减少参数估计量的方差。如果多个解释变量中存在一个或多个随机变量，即随机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或者与误差项同期无关而与异期相关，或者与误差项同期相关，可能导致模型参数的有偏或非一致，经济学者发明了工具变量法来解决随机变量的问题，等等。

由经济计量学的教科书可知，面对模型构建中存在的各种困难，经济学家们都基本成功地找到了应对之策，努力地使数据能很好地符合建模要求，保证经济模型能自圆其说，符合数学逻辑。可以说，一部经济计量学教科书也就是一部如何依据数据建立数量模型、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建立数量模型的过程史。问题随之而来，模型是建立起来了，也通过各种严格的检验了，似乎是更精确了，但使用经过改造后的数据建立起来的模型对客观世界反映的真实程度又有多大呢？如果认定数据是对真实现实的反映，那么建立在加工修匀后数据基础上的研究结论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事实上，客观现实远比数学模型复杂，特别是一些不确定因素，数学模式是永远也无法捕捉和刻画的，这也就决定了数学模型的局限性，数学模型不可能万能。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数量模型，如1909年美国巴布森统计公司发布的巴布森经济活动指数；1911年美国布鲁克迈尔经济研究所编制并发布的涉及股票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等的经济景气指标体系；1917年哈佛大学编制的“经济晴雨表”和进行经济景气预测的著名的“哈佛指数”；1920年英国伦敦与剑桥经济研究所编制的英国商业循环指数；195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设计扩散指数，建立的经济景气监测体系等，以及1955年设计的测度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瓦拉瓦尼斯（Valavanis）模型、1960年建立的反映美国萧条时期经济情况的杜依森伯利-艾克斯坦-费罗姆（Duesenberry-Eekstein-Frolnm）模型等。这些带有典型意义的计量或统计模型或方法，曾在特定时期对经济分析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最终因为经济预测和判断的失灵或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或不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特别是几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频频出现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但经济学家及经济学家们所创立的数量模型最终都未能作出准确预判。更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当危机蔓延、危害日盛时，经济学家们和他们的数量模型始终不能推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人们不得不对名扬一时的模型失去信心，从而不再迷信这些模型。这也让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模型陷入难堪的境地。

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5]曾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估进行过批判，不认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政策目标分析中是有效的。讽刺的是，他对模型的应用还遭到过罗默的批评。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西姆斯^[6]对传统的考尔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设计的关于行为关系的模型设定方法也曾提出过质疑。他指出对模型的短期动态约束是不可信的，但他的批判导致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中的广泛使用。同样，哈佛大学教授奥兰多·帕特森、伊森·福斯认为^①，经济学家与公众的认知往往存在巨大的差距，即便每年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但这也掩盖不了经济学家们所创立的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富尔卡德则认为，经济学家们无法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的本质，许多经济关系模糊不清，许多经济学研究成果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

^① 2015年2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吗？”为题，邀请一些从事社会科学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地位和作用展开分析、批评或辩护，以利比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优劣，防止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促进经济学和跨学科研究的顺利发展。奥兰多·帕特森、伊森·福斯的观点是在这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参引自 <http://www.mbachina.com/html/zx/201708/111288.html>。

一些经济学家还与政治游戏维持着复杂的关系,这令他们易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存在分歧时,他们的观点难以得到真实清晰的表述。

虽然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见仁见智,但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的科学性远低于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甚至低于社会学。除了数量模型的应用问题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者对定性分析方法甚至对其他领域和观点的排斥。因此,需要承认经济学中的数量模型与物理学模型是存在差别的。后者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基础之上,这基本能保证其揭示事物的内在本原,保证其预测能接近客观实际。而经济学中的数量模型则是建立在系列假定之上的,加之削足适履的数据处理和方法,使得其很难精确地捕捉真实世界。在经济学研究的实际中,许多数量模型的背后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本应包括在其间的一些因素可能被忽略,一些因素可能不被捕捉。这类有缺陷、不完整的数量模型直接导致了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的过程将是漫长且十分困难的。

三、经济学理论对实践指导的滞后性

经济学模型的滥用、泛用常常让经济学家们陷入难堪,而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也常使经济学者们无奈。

按照经济学说史的演化脉络,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一书。这是第一本阐释欧洲产业经济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经济学著作,其面世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斯密创立了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国际贸易理论,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经济政策。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逻辑演绎方法,对后世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他创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到了一个高峰。

十九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过尖锐、诙谐的批判。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强调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创立了制度学派。1890年,近代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表了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经济学原理》,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扩充为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企业家才能)四要素,提出以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等来决定均衡价格,创立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诞生的标志性著作。与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凯恩斯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其创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思想后来演变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在他看来,政府可以通过建设大坝、桥梁、公路、铁路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刺激生产、增加就业。凯恩斯等创立的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追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经济活动或涉及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理论,如财政、金融、货币、产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危机、生产效率、生产供给、市场需求、资源有效利用、经济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产权、博弈均衡、消费、行为经济、契约,等等。这些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知识体系,对当时或后世的社会经济都产生过影响甚至重要影响。但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相当多的经济理论的形成都是源起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解决彼时的现实经济问题。在中国,这一特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经济学家探索思考经济问题都是在浓烈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如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制理论、企业发展理论、企业改制理论、商品流通理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分配与消费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生产效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农村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

等。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学家创立了这些理论，毋宁说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思考过这些问题。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更多依赖于社会实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促成了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考。因此，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经济理论存在滞后性。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出现了某些问题，经济学者便热衷于去研究（当然，也有开展前沿或未来问题研究的经济学者），而后形成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当新的问题再度发生、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既有的理论就无法指导解决新问题。例如，没有恰当的理论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没有恰当的理论能说明新工业革命的源起走向。现阶段，中国经济如何自我持续增长？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发展经济？制造业如何升级发展？金融市场如何稳定？宏观经济如何由虚向实？民营企业如何激发投资活力？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似乎没有哪种或哪些经济理论能开出灵丹妙药，拿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经济学理论自身的概念和结构也限制了其应用和发展。保罗·弗莱德尔在他那篇有名的批评数量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滥用的文章中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工程师、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被困在荒岛上没有东西吃。一个装有罐头的箱子被冲到岸上，三个人考虑如何打开罐头。工程师说：让我们爬上那棵树，把罐头扔到岩石上；物理学家说：让我们把罐头放在营火上加热，直到里面的压力增加使它打开；经济学家说：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开罐器。这个故事说明，相对于自然科学这类硬科学，经济科学有着更多的软性或柔性成分。许多事实说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定律、经济学原理，一如天上的星星，辉煌但却让人遥不可及。这些理论社会大众不明白、科学家不明白、政治家不明白、工程师不明白、企业家不明白、商人不明白，有时甚至同领域的经济学家也不明白！试想，这样的经济学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吗？建立在一个或多个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对现实能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这样的研究成果能有多大的应用价值呢？

两百多年的经济理论发展史表明，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理论常常显示出它的无奈和怯力。人们感受不到，或者很少直接感受到经济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和愉悦，恰恰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幸福感和成就感。不能指望经济学家能一朝一夕改变这种状况，但经济学家不能漠视这种现象，需要警醒，需要反思。

四、结 语

在反思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些现实后，不能如本文开头提及的三篇文章中所述的那样，说经济学家傲慢无知^[7]。恰恰相反，有些经济学家极为精明。他们擅长发明新的学术名词，善于使用艰涩的语言，把具体的问题抽象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人如坠云里雾里。然而，无情的事实让不少经济学家不能遂心如愿。他们研究的某些定律此时成立，彼时不成立；某些研究发现有时似乎正确，有时又似乎不正确；某些研究成果，时而管用，时而又不管用；某些经济预测忽而准确，忽而不准。这大大削弱了经济科学在公众心中的位置。

要看到，有一批认真、执着、务实、谦逊的学者，在踏踏实实地研究经济问题，为解决经济问题不断提供着可执行的、可操作的或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些学者值得尊重。但是也要看到，把研究建立在假想虚无的环境中，无视公众需求，严重脱离实际，把数量模型打扮成科学，把数学方程式当作成研究的标尺，这样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更不是个案。事实已经证明，客观事实与数学推理不可同日而语，数量模型不能成为判定事实的决定性依据。在黑板上推演数理模型，在书斋里、在象牙塔里讨论经济问题，这种煞有其事的经济学研究，其实是经济学人的自娱自乐，算不上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也是不可持续和没有生命力的。经济学家、经济学者需要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面对

实际, 解决问题, 把经济学研究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类进步所求之上, 为人类创造福利, 为社会带来效应。这才是真正的经济科学研究, 才是社会和公众所欢迎期待的经济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 [1] [美] 保罗·克鲁格曼. 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J]. 刘利, 张兴胜, 译. 银行家, 2010(7).
- [2] Levinovitzd, A. 经济学家的数学崇拜[N]. 企业家日报, 2017-07-14(W03).
- [3] Pfleiderer, P. *Chameleons: The Misuse of Theoretical Model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Z]. Working Paper No. 3020, 2014.
- [4] Romer, P. M.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5).
- [5] Lucas, R. E. J.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J].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76(1).
- [6] Sims, C. A.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J]. *Econometrica*, 1980(1).
- [7] 宋小川, 乔瑞庆. 经济学家的傲慢与无知[N]. 企业家日报, 2017-07-21(W03).

Reflection on the Reality of Chinese Economics Research

LI Jin-hua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of Economics, namely academic papers on Economics, there exists the phenomenon of mathematical worship or mathematical admiration which is hard to hide. The incompleteness or defect of the quantitative model in Economics leads directly to the uncertainty of research results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overcome. Fac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economic problems, Economic theory often appears to be helpless and timid. It's necessary for economists and economic scholars to walk out of their study and ivory tower, and conduct economics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the real Economics research expected and welcomed by the society and the public.

Key words: economics research; quantitative model; uncertainty; theory lag

(责任编辑 朱 蓓)